

熊召政选集

青山自在紅

召政



熊召政悟禅读史随笔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熊召政选集

看山自在紅

召政



熊召政悟禅读史随笔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山自在红：熊召政悟禅读史随笔/熊召政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
(熊召政选集)
ISBN 7-5411-2384-6

I. 青... II. 熊...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366 号

熊召政选集 青山自在红——熊召政悟禅读史随笔
XIONGZHAOZHENG XUANJI QINGSHAN ZIZAIHONG

策 划 金 平
组 稿 林文询 蔡 曦
责任编辑 林文询 李卫国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黄 迅 晋 冰
责任校对 文 诺等

书 号 ISBN 7-5411-2384-6/I·2000

成品尺寸 230mm×165mm

字 数 148 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 [发行部] (028) 86259303 [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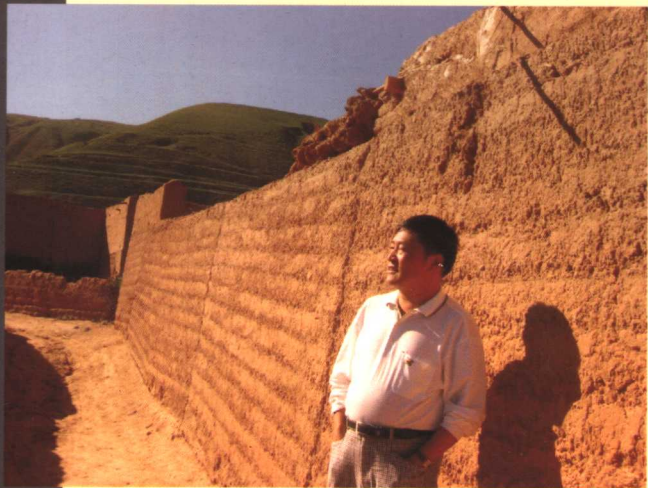
网 址 www.scwys.com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85910167



熊召政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人。

195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参过军，下过乡。22岁起担任英山县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1981年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至今。其间于1984—1986年任《长江文艺》副主编，1985—1989年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创作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已出版诗集五部，散文集两部，报告文学集两部。其诗歌及散文获各种奖项多次。自1993始，历经十年潜心创作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一经问世，便获得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被评论界誉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该书继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及湖北省第六届屈原文艺奖等各种奖项后，又于2005年4月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朗吟飞过洞庭湖	128
诗中三峡	133
《胭脂井》中家国恨	149
朱元璋的戒奢之心	153
权臣并非奸臣	159
宦官是政治的毒瘤	166
谒张居正墓	173
闲话历史真实	185
让历史复活	190
从《张居正》谈历史小说的创作	
——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198
我眼中的张居正	
——在荆州市长江大学的演讲	208
儒者从来做帝师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220

文从忧患出(代序)

拙著《张居正》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许多同道称赞这部小说的成功，得益于我的旧学功底。古典文学，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词歌赋，对于我来讲，都属于“童子功”，在这一点我还有些自信。但是，就其小说的结构，也就是说讲故事的方式而言，尽管我使用了章回小说体，我仍要说《张居正》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颇大。有一次，我与《张居正》的责任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先生论及此事，我说在写作《张居正》的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法国的雨果，他笑着回答说：“你如今成功了，怎么说都可以。”言下之意，他不相信。我告诉他，雨果对我的影响是漫长的。

三十年前，我在县文化馆工作。那时，县文化馆与图书馆没有分家，全县藏书最为丰富的，就该是县文化馆的图书室了。但这些藏书，因为牵扯到封、资、修，十之八九都不向读者开放。束之高阁，积满尘垢。我因占了馆员之便宜，更因为馆长理解我的求知欲，便给了我一把书库的钥匙。每天一大早，我开门进库，带一瓶水，一个馒头（中间夹两分钱的咸菜）权充午餐，在书库里一



泡一整天。

拿今天的眼光看，这小书库的藏书，可能还没有我个人的藏书多，但在当时，我像阿里巴巴找到了藏宝的山洞。大约有两年时间，我独占了这间光线昏暗、蛛网蒙窗的书库。

库内的十几架书，中国古典多，而外国文学，大约有两三架吧，虽然不多，但都是经典。在那两三年里，我读了如下作品：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小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小仲马的《茶花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狄更斯的《双城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乔万尼奥尼的《斯巴达克斯》、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等。除以上所述，书库里所藏的巴尔扎克与雨果这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最多，几乎他们作品中所有的中译本都度列其中，而且，我也全部读完。

当然，除了小说外，还有戏剧与诗歌、散文，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普希金、莱蒙托夫、济慈、裴多菲、波特莱尔与聂鲁达等等，我亦通读，这些耀眼的星座，亦曾照亮我文学的星空，但因我这篇文章以谈小说为主，所以，暂时不能顾及他们。

二

2004年10月，我曾应中国海洋大学之邀，去青岛参加

一次由科学家与作家组成的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在会上，有一位久负盛名的海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生直言不讳的说，他非常喜欢金庸的作品，他已把金庸全集通读了三遍，现正在读第四遍。

一个作家的全集，而不是某一部作品能够被人通读四遍，这个作家没有理由不自豪。对金庸的作品，文学界同仁褒贬不一，但在世界范围内的华人社会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享有盛誉并经久不衰，这是不争的事实。

谈外国小说，忽然说起金庸来，似乎跑题了，其实并没有。我是由金庸想起了法国的大仲马。我记得第一次读大仲马的代表作《基度山伯爵》，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不记得是怎样翻出这本书来的，加之我身处偏僻的山区县城，又非书香门第，所以也完全不知道大仲马何许人也，但当我拿起四本一套的《基度山伯爵》的第一本，读完第一章后，我就完全放不下手了。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书库里是不准开电灯的。为了防范，甚至连电线也剪掉了。但我还只是看了第一本的大半。眼看天黑，我心急如猫抓，馆长早就与我约法三章，我可以躲进书库看书，但决不能把任何一本书携出门外。但书中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抓住我的心，如果放下书本等到第二天再接着读，那天晚上我肯定会彻夜失眠。于是，我走出书库硬着头皮找馆长，希望他允许我把《基度山伯爵》带回寝室里挑灯夜读，馆长一口回绝。我于是又提出折中方案，能否让我夜里待在书库里，他说书库内不准开电灯，我说想好了，我去借一只手电筒，买两节新电池。馆长终于答应，



为了防盗，也为了掩人耳目，馆长把我送进书屋后，就在外面把门反锁了。

斯时正值盛夏，窗户紧闭的书屋闷热如蒸笼，我进去不到五分钟就全身湿透。更有数不清的蚊虫永无休止地向我偷袭叮咬，但因为急于想知道基度山伯爵的复仇结果，我已经对闷热与叮咬没有感觉了，我撤亮手电筒，开始了愉悦与紧张的阅读。

我原本打算读到某一处，也就是说某一个情节结束时，就放下书本眯一觉。但我的这一计划落空。大仲马的小说，情节复杂多变，悬念迭起，不一口气读完，你就会觉得非常难受。大约天快亮时，我读完第二本，手电筒电池耗尽，我再也无法读下去，也无法眯一觉，我靠着书架，满脑子都是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并猜想在以后的篇章里，情节将如何发展……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夜。此前，我也有过彻夜阅读的经历，那是在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我在读线装本的《封神榜》。老实说，这本书是可以中途放下的，我之所以彻夜读它，乃是因为第二天我就要把这本书还给人家。这一夜的经历也很有趣，值得记述：那时乡村还没有电灯，农民照明用梓油灯、松明、煤油灯三种。用煤油灯者，是人们羡慕的“贵族”，我拥有一盏煤油灯，所有的长夜便都温馨而幸福。那天读到半夜，没有了煤油，真正地油尽灯枯。我寻找解决的办法，发现了小半瓶菜油。我试着把菜油加一点到灯壶里，居然也能点亮灯捻儿，于是阅读又进

行了下去。这一夜，《封神榜》是读完了，但其直接后果是，我半个月没有吃到一点油水。当时物资紧缺，农村中每人每月供应四两菜油，我拿来作为照明之用，就只能吃清水煮萝卜了。

两次彻底不眠的读书感受，就其本身的阅读快感而言，后者强于前者。

一部作品给人的阅读快感，因人而异。我想，《基度山伯爵》能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一是因为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文化沙漠上备受煎熬，我们无法读到纯粹的文学；二是因为大仲马不同于别的作家，他特别会讲故事。他的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在这一点上，金庸先生与大仲马庶几近之。

三

年轻时不但是生命的花季，亦是文学的花季。可以说，我读过的小说，五分之四都是在三十岁之前完成的。我从十二岁就开始读小说，二十岁之前，主要是阅读苏联及新中国的小说，二十岁至三十岁这十年，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

我的青年时代，内心充满渴望与向往，而世界则显得呆板而冷酷。在这种业界里生活是极不愉快的，它压制了你的许多骚动，也扭曲了你的许多人性。但也有一个好处，你无法在现实中找到诱惑，你的时间不会被咖

啡屋、美国大片、网球场、QQ与八卦新闻等等奇异的小资文化分割成无法拼拢的碎片。那时，你虽然不拥有完整的白天，但至少你拥有完整的夜晚。

大概从十五岁开始，我似乎将所有的夜晚都用在阅读上。古人有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注脚。照此读书，便有极端的功利性。我当时读如此之多的外国小说，并没有任何功利性的想法，我只是觉得阅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我个人的嗜好，喜欢情节生动曲折的小说，冗长的心理描写和节奏缓慢的叙述，会令我昏昏欲睡。青少年时代，我都是在故乡度过，由于娱乐生活的缺乏，鼓书艺人成为受人欢迎的职业。夏夜的禾场、冬夜的火塘边，都是鼓书艺人献技的地方，我听过他们绘声绘色讲述的《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粉妆楼》《大八义》等等，中国小说最早不叫小说，而称为话本。这话本，便是说书人的创作。而我故乡的人，管说书叫“讲传”。我不知道西方有没有“讲传”这个传统。但我知道，像《基度山伯爵》《斯巴达克斯》《十字军骑士》这一类小说，与中国的话本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曾把这三部小说当作“传”讲给乡亲们听过。他们听得屏神静气，啧啧称奇。不止一次，乡亲们对我竖起大拇指赞道：“洋传也好听。”农民的表达总是很精确，外国小说被他们称之为“洋传”，雅而贴切。

至今，我写小说还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先把构思

的情节讲给人听，如果听者被吸引，一再追问“下回如何分解”，则这情节是可行的，否则则要推倒重来。

电影与电视产生之后，给小说的传播增加了新的途径。这些年来，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小说名著，大部分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小说再次成为了“话本”，不过说书人的角色有了改变——导演和演员复活了“话本”的内容。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有的小说被影视公司一改再改，似乎永远保有兴趣。而另外一些小说则无法改变纸质的命运，影视投资商碰都不肯碰它们一下，这是因为它们的叙事性太差，不具备“话本”的性质。

当然，我并不认为被影视公司老板看中的小说就一定是好小说，反之，不适宜改编影视剧的小说就是差的小说。对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位小说家都有权利根据自身的美学追求来写自己的小说。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有的作家读者群很大，有的则很小。有人认为，通俗作家的读者群大，而经典作家的读者群小。我不大同意这个说法。经典与通俗，不在于受众的多寡，而在于自己小说中的叙事方式。把小说当作一本哲学书来读，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但是通过小说的人物与情节让人悟到一点什么东西，则又另当别论了。

记得曾有人把金庸与鲁迅拿来作比较，并痛言如果金庸是文学大师，那鲁迅怎么办？此前，也有学者把大仲马与雨果拿来作比较，认为只要一读作品，两人的优劣便不言自明。这样的争论听多了，我便暗自庆幸，我年轻



时幸亏不认识任何学问大师，否则，我恐怕终生都不会读到大仲马了。

我不排斥大仲马，同时，我也承认，雨果对我的影响更大。

四

读完一部小说，然后咀嚼它并理解它，是我二十八岁以后的事。

二十八岁那年，我从县文化馆调到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就在这一年，我认识了徐迟。

自1979年发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后，徐老又为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等著名科学家立传，从而在中国文坛掀起了“徐迟旋风”。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徐老对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感，我想，这大约是他并不欣赏我的成名作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的缘故，徐迟是一个抒情而浪漫的人，同时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诗、音乐与绘画天生丽质，最具美文的表现形式。而我的那首诗剑拔弩张，是愤怒的产物。他不大喜欢“愤怒出诗人”的说法。后来，他为我诗集《瘠地上的樱桃》写序言，干脆挑明了说：“我历来不同意把诗变化成匕首和大炮。”

徐迟与我产生谈话的兴趣，是从《楚辞》开始。第二次见他时，他在住院，枕边放了一套线装的《楚辞》。他问我一个很怪的问题：“魂一夕而九逝”这句诗，这个

九逝究竟是不是实指？也就是说，人有没有可能一个晚上灵魂九次出窍？我回答说，此处的九，是多的意思。同时，九亦是阳极，与之对称的六，是阴极，灵魂出窍应该是至阴的事，怎么反而用了一个阳极的数字呢？这个九，肯定不是实指。老实说，这个回答有狡辩的味道，因为我虽然很早就背读过《楚辞》中的许多篇章，但对每句诗的细微之处，并没有像徐老这样探微索隐。但是，正是这次谈话，却确定了我与徐迟的师生关系，他开始主动约我谈话了，并对我说：“我要花五年的时间，把你改造一下。你现在虽然也在写作，写出的东西也能发表，但你不知道为何而写作，以及如何写作。”徐老的话很严厉，但年轻气盛的我，还是诚惶诚恐地接受了。这一来是因为他的盛名，二来通过两次谈话，他深厚的西方文学修养已深深地把我折服。他给我定了一个庞大的学习计划，主要是外国文学。他开了一个书单，大约有近百部西方名著。打头的第一部，就是《荷马史诗》。我告诉他，这书单中的许多书，我都已读过。他听了很不高兴，责问：“你都读懂了吗？”他说着从书架上抽出已经发黄的旧版《荷马史诗》，翻出一段来要我看，是描写盾牌的，占了几个页码。徐老说：“人家荷马可以把一个简单的盾牌写出两百多行诗来，而且一点也不枯燥，这种想象力你有吗？没有你就要学习，研究人家的想象力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能够在作品中恰当地表现出来。”这种责备对于我不啻于一记棒喝，并开始汗颜。原来，我读过那么多作品，只是“看”，而并没有“读”，也就是说，我只是作为一个



读者来消遣，而没有以作家的眼光来研究。

从此，在徐老面前再也不敢随便说话，而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读书。从1982年至1986年，只要在武汉，我每星期必得两个半天到徐老家里，向他汇报读书心得，然后听取他的指教。比之第一次躲在英山文化馆的书库里读书的那两年，这第二次的五年，我倒真读懂了许多作家的作品。像雨果，徐迟让我非常认真地将他的《悲惨世界》《笑面人》与《巴黎圣母院》各读两遍，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情节的设置、人物命运的纠葛、场景的合理运用、对话与叙述、隐性的主题与显性的故事等等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1988年，在经过数年的学习后，我产生了强烈地创作小说的冲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徐老，他说“你可以试试”。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写出了第一部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酒色财气》，这本书尽管也出版了，但毫无影响，甚至我在看三校样时，已自气馁，觉得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当然，最终书还是印了出来，徐老看过后说：“你这书没有写好，已不是文学的修养问题，而是你的生活不够丰富，你仿效雨果，但你没有经历雨果的坎坷与磨难，因此，你也不具备雨果式的忧患。”

怎样才能获得雨果式的忧患呢？徐老从要我读书发展到要我读人。这一点倒真是难为了我，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在那以后的岁月中，上苍眷顾，让我得以有机会尝到过雨果式的曲折人生，并得以在广阔的社会生

活中读各式各样的人，分析研究这些人，并进而研究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不知不觉地，雨果式的忧患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张居正》，便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

最后这一番话，表面上看与读书无关，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如果没有从漫长的阅读中，使我的思想具有历史的沧桑感，分析和判断现实中的人和事，我就有可能发生谬误。至少，现在面对生活中众多的人与事，我知道哪些可以变成文学，哪些则不能。

青山自在红

吕欧